

金代的孔庙与庙学述略

刘 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金代是中国孔庙和庙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金代孔庙和庙学的修建, 是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文章从发展脉络、经费来源和地域分布三个方面入手, 对金代的孔庙和庙学作以简要梳理总结, 以期使金代孔庙和庙学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展现。

关键词: 金朝; 孔庙; 庙学; 金代教育; 金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5) 12-0126-06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 儒学是金代国家意识形态, 是金代的主流文化。其孔庙和庙学^① 修建的情况, 是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金代著名学者王若虚有一段论述 “国家自承平以来, 文治蜗兴。下至僻邑。莫不有庙学以为教。其于崇儒重道, 不可谓不至。”^② 金代因学尊庙, 又以庙表学, 对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金代还是中国孔庙和庙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时至今日, 金代修建的碑亭依然是曲阜孔庙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对金代的孔庙和庙学作以系统梳理, 对中国孔庙和庙学史的完善也是很有意义的。范寿琨先生据《金文最》统计, 金代修建孔庙 47 座。^③ 《世界孔子庙研究》一书提出金朝 102 个京府、散府、节镇、防御州学校应该都建设了孔子庙。^④ 本文据《全辽金文》、《辽金元石刻史料全编》统计, 金代共修建孔庙和庙学 83 座, 101 次。^⑤

一、发展脉络缕析

有文献可考、可以确定修建时间的金代孔庙和庙学 60 座, 73 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为发展时期, 即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统治时期; 第二阶段为相对繁荣时期, 即世宗、章宗统治时期; 第三阶段为萧条时期, 即卫绍王、宣宗、哀宗统治时期。

作者简介: 刘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儒学、中国传统文化。

^① 张鸣歧先生《金元之际庙学考论》一文, 曾对学校 and 庙学称谓的关系有过辨析, 他提出官设各级儒学, 按国家教令或行政区划称为州、县学; 而在士大夫论述学校的著作中则称为庙学, 二者是一码事,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称谓不同罢了。参见张鸣歧《金元之际庙学考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6 期。我们以此为据, 凡儒学、庙学、孔子庙、宣圣庙、府学、县学皆以孔庙和庙学概言之。

^② 王若虚《行唐县重修学记》, 载《全辽金文》,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第 2514 页。

^③ 范寿琨《论金代的孔庙建置及其作用》, 《社会科学辑刊》1993 年第 2 期。

^④ 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庙研究》,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 第 81 页。

^⑤ 此数字统计除下文所述孔庙和庙学外, 含无法确定修建时间、修建地点的孔庙和庙学。

1. 发展时期

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统治金 48 年，共修孔庙和庙学 13 座，16 次。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后统治 9 年，在创建制度、力行改革的同时，不断攻打辽朝诸路，对中原文化持吸收借鉴态度，为金代孔庙和庙学的修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孔庙和庙学修建尚未顾及。

太宗统治 12 年，举辽灭宋，大体上奠定了有金一代疆土，在此期间金代共修孔庙 5 座次。包括大城县庙学、渔阳宣圣庙、冀州文庙、太原府学文庙和赵州庙学。其修建特点有二，一是规模小，多在原有基础上因陋就简，或就地取材。二是因处于征伐阶段，所以孔庙修建的倡导者多为比较开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首脑。如太原府学文庙，“耶律公来师是邦”，“但取故宫舍余材以成之”。^①

熙宗统治 14 年，修建孔庙 5 座次。包括渔阳宣圣庙（重建）、上京孔子庙、兖州宣圣庙、博州庙学和曲沃县庙学。这一时期金与南宋两次签署和议，虽无大的对外战争，但是金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这应该是孔庙和庙学修建没有发展的根本原因。

海陵王统治 13 年间，虽然荒淫残暴，但是修建孔庙和庙学 5 座，6 次。包括太原府学文庙（修缮）、长子县文庙（2 次）、密州州学、京兆府学和洺州宗城县宣圣庙。金代孔庙和庙学的修建呈上升态势。究其原因，这是海陵王本人接受汉文化和正统观念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现实需要。

2. 相对繁荣时期

世宗、章宗统治时期，金朝社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金史》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升平。”^②世宗即位后，以海陵王为鉴，实行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以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定五年（1165）宋金签署“乾道之盟”，又称隆兴和议，自此后双方 40 年未发生大的战争，基本保持了和平对峙局面，为金朝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地社会环境。上京城内外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业区，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市井繁荣。章宗在位 21 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③。赵秉文《郟县文庙创建讲堂记》云“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修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修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④这一时期孔庙的修建不仅数量，而且在建筑规模上都超过金朝任一历史时期。尽管如此，依然与宋朝、元朝的孔庙和庙学修建远不能相比，所以谓之相对繁荣时期。

就数量而言，世宗、章宗统治 50 年，修建孔庙和庙学 38 座，47 次。此前太祖、太宗、熙宗和海陵王统治 48 年，共修建孔庙和庙学 13 座，16 次。此后卫绍王、宣宗和哀宗统治 27 年，共修建孔庙和庙学 10 座次。就建筑规模而言，我们从修建孔庙和庙学所耗经费可见其建筑规模非此前可比。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王遵古倡导重建增建博州庙学“计其费，无虑五百万，皆贍学之赢也”^⑤。明昌四年（1193）增建曲阜兖国公庙，“计营造费用之不轻，系国币泉流而支給，非出于民也”^⑥。明昌六年（1195）原址重建棣州文庙“费当二百万”^⑦。

3. 衰落时期

卫绍王、宣宗、哀宗统治 27 年，共修建孔庙和庙学 10 座次。金章宗统治时期虽然一代文治蔚为壮观，然而章宗末年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同时金一方面要应对来自鞑靼的侵扰，一方面要抵制南宋的

① 赵泐《太原府学文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755 页。

② 《金史》卷 1。

③ 《金史》卷 1。

④ 赵秉文《郟县文庙创建讲堂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375 页。

⑤ 王去非《博州重修庙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127 页。

⑥ 穆昌世《曲阜重修兖国公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702 页。

⑦ 党怀英《棣州重修庙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507 页。

北伐。金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贞祐南渡,北方战火导致孔庙和庙学饱受战火荼毒,孔庙和庙学修建反不及世宗统治时期,开始呈下滑趋势。卫绍王即位后,政乱于内,兵败于外,金的衰亡一发不可收拾,这一时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政府,皆难有余力顾及孔庙和庙学的修建。

总之,金代孔庙和庙学的发展与金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化进程同步,与金代社会发展兴衰大势是一致的。

二、经费来源探略

关于金朝孔庙和庙学修建的经费来源,有明确文献记载者42座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费修建,二是公私合资修建,三是个人集资修建。其中个人集资修建数量最多,为19座次,公私合资修建13座次,公费修建数量最少,10座次。

1. 公费修建的孔庙和庙学

据不完全统计,金代有明确文献记载,公费修建的孔庙和庙学有10座次,其中包括1座颜庙。统计显示金朝公费修建孔庙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直接出资,共5座次。包括曲阜至圣文宣王庙、曲阜兖国公庙、博州庙学、许州宣圣庙、夏邑县儒学。如曲阜至圣文宣王庙,承安二年(1197)修建,“有司承召,度材庀工,计所当费,为钱七万六千四百余千,诏并赐之”^①。曲阜兖国公庙,明昌四年(1193)增建,“计营造费用之不轻,系国帑泉流而支給,非出于民也”^②。第二种情况是就地取材,或政府提供建筑物资。包括冀州文庙、太原府学文庙、冀氏县文宣王庙、泰安州宣圣庙4座次。如冀州文庙,天会八年(1130)修建,节度使太师贾公倡导,以城隅观宇改建。^③冀氏县文宣王庙,大定十一年(1171)创建,令尹及簿公“因籍官之遗材”^④。第三种情况是通过申请减免税收修建孔庙。曲沃县庙学,皇统元年原址重建,邑宰宋公“申漕司以消其租”^⑤。

2. 公私合资修建的孔庙和庙学

金朝公私合资修建孔庙和庙学12座次,可分为以公费为主、个人出资为主、公私平分秋色三种情况。

以公费为主修建的孔庙和庙学6座次,分别为渔阳宣圣庙、涿州文宣王庙、京兆府府学、洺州宗城县宣圣庙、潞城县宣圣庙。如渔阳宣圣庙,熙宗统治时期重建,儒生刘子元等首倡,“官给其费,所不及者州士人助成之”^⑥。洺州宗城县宣圣庙,正隆元年修建,县簿高元、同事赵居道倡导,“用不足”,“则邑中业儒者魏选等二十余人共成之”^⑦。

以个人出资为主修建的孔庙和庙学6座次,分别为行唐县庙学、长子县宣圣庙、棣州文庙、滑州文庙、莱州胶水县宣圣庙、闻喜县宣圣庙。棣州文庙,明昌六年(1195)原址重建,嘉议大夫石玠倡议,“费当二百万”,“有司之吝,七分之数而才得其一”^⑧,其余为士庶捐献。莱州胶水县宣圣庙,明昌六年县主簿祖公倡导,“计所需一百六十余千”,“官给只一十六贯有零,祖公率出己俸,僚属、邑民共成之”^⑨。

① 党怀英《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4页。

② 穆昌世《曲阜重修兖国公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02页。

③ 张亿《创建文庙学校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23页。

④ 李忠辅《冀氏县重修文宣王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⑤ 史中和《曲沃县建庙学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91页。

⑥ 施宣生《渔阳重建庙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69页。

⑦ 傅慎微《洺州宗城县新修宣圣庙记》,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013页。

⑧ 党怀英《棣州重修庙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6页。

⑨ 郭璜《金莱州胶水县重修宣圣庙碑》,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754页。

公私各占一半的1座次。密州州学，正隆二年（1157）重建，节副张天宇“请于计司，得钱四十万，且捐己俸以倡僚属，而乡士大夫乐助其成，又得钱四十万”^①。

3. 个人集资修建的孔庙和庙学

金朝个人集资修建孔庙和庙学19座，24次。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倡导，率先出资，并主持修建。包括鸡泽县庙学、保德州庙学、潞州儒学、襄陵庙学、辽州庙学、衮州庙学、清河县庙学、文登县庙学、章邱县宣圣庙、栖霞县庙学、新乡庙学、肥乡县文宣王庙、清丰县宣圣庙、邺县讲堂、绥德州儒学、万全县宣圣庙、曲沃县庙学。如襄陵庙学，泰和八年（1208）县宰丹阳赵公“首出俸钱二万，米十斛，倡之于前。诸生各输所有，和之于后。暨邑商酒者，不待劝督，亦自愿助所费，建始落成。”^②辽州庙学，大定十四年（1174）原址重建，辽州太守赵某倡导，乡贡进士张景华“出己俸率先，僚属官民佑用者，不谋而同”^③。万全县宣圣庙，泰和四年（1204）重建，河中万全县簿刘从谦“罄其俸给所余，不问家之有无，一皆出之，以佐经费。于是邑中之民，富者助财，贫者助力”^④。曲沃县庙学，泰和元年（1201）修建，邑宰张公、主簿翟公“各捐己俸以倡，邑人从之”^⑤。

金朝个人集资修建孔庙和庙学的另一种情况纯系民间自发行为，民众倡议，民间出资，民间组织修建，只是为数比较少。包括大定二十五年（1185）顾氏兄弟重修的曲周县庙学，大定二十四年（1184）新建的济阳宣圣庙。关于济阳宣圣庙有这样记载：

一日诸文士相谓曰：“吾辈尚有闾庐，而先圣先师无奠币献牲之地。彼释老之徒，溺于怪诞，犹知□饰祠宇，丹刻轮奂，无所不至，今吾徒反不如彼，得无衄耶？且十室必有忠信，况万室之邑乎。吾徒苟能倡之以诚，岂无贤达以诚相应者哉。因□诸邑人，得衣冠之族赵氏者愿献地，杨彪者画其位置，愿为殿、为堂、为斋、为庖，□单父商者王彦愿为戟槩门及两庑，进士李仲熊为之倡□，汝翼范师祖、卢守节、马遵古、张炎、李亦颜数人相左右之，请于有司，既允。而后除地于蓬□之聚，鸠财庀工，以大定十四年□□月经始，二十四年八月落成□新。”^⑥

由此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济阳宣圣庙完全由民间修建，民众自己出地、出钱、出力，仅“请于有司”，得到批准，自发组织修建完成。修建的时间按照碑文记载经始于大定十四年□月，二十四年八月落成，历时10年，常理推断应该是有误，推断是大定二十四年□月经始，八月建成，承安三年立碑。此外文中所述“彼释老之徒，溺于怪诞，犹知□饰祠宇，丹刻轮奂，无所不至，今吾徒反不如彼，得无衄耶？”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金代虽然三教合一有突出表现，但在多数百姓心目中还是视儒学为正宗。

总之，金代孔庙与庙学的发展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制约，综合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历史时期孔庙和庙学修建多，规模大；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地区较之经济贫困、自然资源贫瘠的地区，其孔庙和庙学修建的数量和规模有明显差别。

三、地域分布概览

金朝疆域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的全部，陕西大部，内蒙古、甘肃的东部，俄罗斯东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方省的一部分。关于金代的孔庙和庙学，有文献记载、可以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查到准确位置的共47座，65次。具体分布

① 王堪《密州修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83页。

② 孔天监《襄陵县创修庙学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32页。

③ 胡聘之《辽州重修学记》，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

④ 张邦彦《万全县重修宣圣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20页。

⑤ 杨普《重修曲沃县学宫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84页。

⑥ 陈大举《济阳创建宣圣庙碑》，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9页。

如下:

1. 以行政区域划分

金朝以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全域共设的十九路。金代的孔庙和庙学按路分布,具体为河东南路11座,17次;河东北路2座,7次;山东西路6座,7次;山东东路6座次;河北东路1座,2次;河北西路5座次;大名府路5座,7次;南京路5座,6次。中都路3座,4次。上京路1座次;西京路1座次;鄜延路1座次;1次。京兆府路1座次。其余河东南路和山东东路、西路最多,而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凤翔路、庆原路、临洮路为空白。

2. 以历史沿革划分

金朝疆域按其历史沿革可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区域与漠南地区,大体为上京路辖区。这是金朝龙兴之地,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还有契丹、奚、渤海以及五国部、吉里迷、兀的改等各族。金朝建国之初,对此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上京会宁府是金朝第一个都城,天会十五年(1137)，“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①。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封建时代地理位置最北的孔庙。

第二种情况是辽上京临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等燕云十六州,大体为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中都路、西京路辖区。这里居民主要是汉族,长期以来受异族统治,且历史上为辽和北宋边界,战争不断,所以孔庙和庙学修建的历史基础薄弱,与中原地区相较,文化底蕴也显不足,所以金朝的孔庙和庙学修建不多。就现有文献统计,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没有孔庙和庙学修建。西京路修建1座,即应州庙学。应州庙学曾历时两次修建,同知张侯大定二十五年(1185)修建未完,明昌初节度王公主主持修建完成,“总费几七十万”^②。中都路乃金朝第二个都城燕京所在地,现有文献统计,中都路修建孔庙和庙学3座,4次,是金朝北部地区修建孔庙最多的地区。包括大城县庙学、渔阳宣圣庙、涿州文宣王庙。

第三种情况是原宋朝领地的淮河、秦岭以北之地,主要为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大名府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南京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统辖,主要居民也是汉族。由于新受异族统治,大多不愿受金廷管制。先后由张楚与刘齐等傀儡政权统治,最后由金廷以汉法直接管理,总计修建孔庙和庙学42座次,其中以河东和山东地区最多。河东南路修建孔庙11座,17次,包括冀氏县文轩王庙、上党儒学、潞州儒学、闻喜县宣圣庙、夏县儒学、长子县宣圣庙、襄陵庙学、赵州庙学、高平县宣圣庙、泽州庙学、潞城县宣圣庙。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陈大举《济阳创建宣圣庙碑》云“天下十有九路,文风号称郁郁然者莫如山东。”^③山东西路修建6座次,分别为兖州宣圣庙、泰安州宣圣庙、博州庙学、曲阜至圣文宣王庙、曲阜国公庙、棣州文庙。山东东路修建6座次,分别为密州州学、清河县庙学、文登县庙学、章邱县宣圣庙、栖霞县学庙、济阳宣圣庙。山东两路所修建孔庙和庙学其建筑规模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3. 地域分布特点

金代孔庙和庙学的地域分布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南方多北方少。金代统治的北方地区多为原辽统治地区,包括金女真发源地,占金统治地区面积的四分之三,但是只修建孔庙和庙学5座次,而金代所修建的孔庙和庙学可以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查到明确位置的47座,65次。北方只占十分之一强。南方原为宋代统治区域,所留孔庙和庙学遗址多,文化底蕴深厚,崇儒重道观念根深蒂固,风气所及,修建孔庙和庙学数量远胜于北方,总数为42座,所占比例近十分之九。

^① 《金史》卷7。

^② 李仲略《应州重建庙学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69页。

^③ 陈大举《济阳创建宣圣庙碑》,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9页。

其二是腹地多边疆少。金朝修建的孔庙和庙学多集中于中原腹地，边界地区修建很少。金代 19 路行政区域中，现有资料统计没有修建孔庙和庙学的，除东北地区的东京路、咸平璐外，位于中原地区的都为边疆诸路。凤翔路、临洮路、庆原路与西夏交界，无修建孔庙和庙学记录。鄜延路与西夏交界，修建孔庙和庙学 1 座。河东北路与西夏交界，修建孔庙和庙学 2 座，而其近邻河东南路修建孔庙和庙学的数量 11 座，为金代之最，究其原因，应与其地处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三是三个都城都重视孔庙和庙学的修建。上京路虽然地处金朝的最北部地区，长期为女真族、契丹族统治，但是作为金代的第一个都城，以其政治需要，天会十五年（1137）修建了上京孔庙。中都路为金朝第二个都城燕京所在地，在长期以来所有受异族统治地区中，中都路是修建孔庙和庙学最多的地区，3 座，4 次。南京路为金代第三个都城所在地，虽然处于宋金交界，但是修建孔庙和庙学 5 座次，在金代诸路中属于比较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都城在金代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重要，一方面也与中原文化的长期浸染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金代孔庙与庙学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以上影响孔庙与庙学历史发展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以外，影响金代孔庙和庙学修建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为因素，有时地方官的重视程度甚至成为影响一个地区孔庙和庙学修建的决定性因素。以长子县宣圣庙为例，“正隆之后，广威刘公，奉直王公继为邑宰，”“皆有增修，其规制轮换，有加其旧，然功未克终，而具已代去。”明昌年间“官为给钱以缮修焉。然岁比不登，前政亦倦勤，故因循五六年未克就绪。”直至承安二年（1197），由于地方官的重视，官吏、士人“出家资以佐其费”，“起于岁之初夏，而告成于岁之秋。”^①所以，一方面孔庙的修建往往被地方官视为“不急之务”，因循延置，如王若虚《行唐县重修学记》所载“国家自承平以来，文治蜩兴，下至僻邑，莫不有庙学以为教，其于崇儒重道，不可谓不至。而所在有司或不能推其意，往往安于苟简，而恬不闻焉，则亦名在而实亡。”^②又如赵秉文《裕州学记》云“世远道丧，净佛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虽以时举，吏惰不虔，备故事而已，非所以安圣灵、致崇极之意也。”^③再如左容《夏邑县重修儒学》云“夏邑旧为剧县，为政者但区区于簿书期会，以舒目前之患，而以学校为不急之务，漫不省视者十之八九。”^④另一方面只要由重视文教的地方官主事，孔庙和庙学修建就成为迫在眉睫的“急务”，所以金代孔庙和庙学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偶然性。当然，由于史料所限，也由于个人能力所限，本文所作统计并不全面，金代所修建的孔庙和庙学数量不止于此。管中窥豹，我们或可从中大体了解到金代孔庙和庙学的概貌。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史倬 《长子县重修宣圣庙碑》，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037 页。

② 王若虚 《行唐县重修学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514 页。

③ 赵秉文 《裕州学记》，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289 页。

④ 左容 《夏邑县重修儒学》，载《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861 页。